

輔仁大學校史簡介

2008.1.22 校史室 陳方中

一、輔仁大學創建的背景

(一) 什麼是天主教大學？

在歐洲社會的傳統，辦教育並不是政府的責任，而是由教會負責。中古時期有名的大學，都是由教會興辦。大學強調學術自由，不希望被世俗君主、地方統治者或甚至是主教控制，因此有許多大學隸屬於教廷，教廷實際上鞭長莫及，實質上即達成大學自主的目的。一所傳統的天主教大學按照其學術特性，是以神學院為核心的，然後有文學、醫學、法律等不同學院。

1789 年法國大革命後，歐洲各國政府開始自己主導教育權，在歐洲歷史上，19 世紀各國陸續發生政府與教會爭奪教育權事件。經過一定時間的發展，遂出現政府所設立的公立大學，其中包括部份從教會接收的大學，例如巴黎大學。然後在某些政教關係較良好的國家，有保留下來的天主教大學，例如比利時魯汶大學。以及在此之後陸續設立的天主教大學及一般私立大學。

天主教大學與一般大學不同處主要在於生命觀及價值觀的差異，由此而產生其課程及研究取向的差異。在天主教大學發展的歷史過程中，他一方面必須持續堅守其價值觀及生命觀，另一方面則學習到以包容態度，在學術上容納不同意見，以學術自由作為天主教大學與一般大學共通的基本價值。

(二) 為什麼要在中國設立天主教大學

19 世紀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，在其國內都有政府與教會爭奪教育權經驗，傳教士多半在修院中接受教育，他們另有一種經驗，反宗教人士許多來自於天主教大學，因此覺得沒有必要在中國設立大學，因為他們認為對於傳播福音沒有幫助。另一方面，基督教傳教士則在 19 世紀 80 年代後，中國開始設立大學，例如聖約翰大學、東吳大學、協和大學等，並且開始在中國的新式教育中產生愈益增大的影響力。

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中，教育是由政府主辦，地方士紳協助，天主教信徒眼見新式教育的主導權被基督教拿走，而外國天主教傳教士對此則不動如山，於是產生焦慮感。

另一方面，中國天主教徒亦不滿於外國傳教士不重視中國文化，在他們看來，不願在中國設立天主教大學，亦為不重視中國文化的心理，在一種覺醒與改革的氣氛中，設立天主教大學乃是中國天主教知識分子的共識。

（三）馬相伯與英斂之

有兩位清末民初的有名教友馬相伯與英斂之，遂在 1912 年聯合上書教宗，請求在中國華北地區設立大學。

馬相伯。1840 年生於江蘇丹徒。幼年入徐匯公學念書，然後加入耶穌會，成為神職人員。1877 年時離開教會，曾結婚，生有一子一女，1898 年回到教會。1903 年在徐家匯天文台旁，創設震旦公學，是為震旦學院的前身。1905 年又創建復旦公學，是現在復旦大學的前身。

英斂之。1866 年生，是滿洲皇族，據他自己說是念了湯若望的《主制群徵》，在弱冠之年領洗信教，1901 年，他在天津創辦了《大公報》，雖不是中國最早的報紙，但可說是最有聲望的報紙。

這兩位天主教徒，在 1912 年聯合上書教宗，請求在中國華北地區設立天主教大學。

〈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〉：

「乃在我華，提倡學問，而開大學堂者，英、德、美之耶穌教人都有，獨我羅馬聖教尚付闕如，豈不痛哉。」

「方今我國政治之不良，科學之不明，實業之不精，土地之荒蕪，工藝之疏窳，學堂之淺陋，隨處皆然。」

「以故誠得我至聖父師大發慈憫，多遣教中明達熱切諸博士，於通都大邑如北京者，創一大學，廣收教內外之學生，以樹通國中之模範，庶使教中可因學問輔持社會，教外可因學問迎受真光。」

（四）美國本篤會

教廷驟然接得兩位中國教友上書，將信將疑，不過信的成份多，疑的成份少。因為教廷多年來，對法國藉口保護在華天主教，實際擴張國家利益、阻礙教會正常發展的情形經常不滿。此報告更增添了法國破壞天主教形象的證據。無論如何，必須調查實際情形，於是先後撰寫問卷，令在華傳教士擔任特使，訪問全中國各教區。這還不夠周全，於是再令奧圖爾來華進行調查（1920 年）。

奧圖爾何許人也？美國教區司鐸本篤會第三會會士。此前從未來過中國，來華後和英斂之有過談話，然後到羅馬和教宗報告，最終，教宗下定決心請美國本篤會士來華，負責在北平設立大學。

爲何是美國本篤會？本篤會在歐洲中世紀歷史中保存學術的名聲；本篤會是隱修院性質，不是傳教修會，不會給傳教團體壓力。美國當時是歐美各國在華利益較少者。

二、北平輔大時期（1925~1950~1952）

（一） 輔仁社（1925）

英斂之於 1913 年，即在其家（他和隆裕太后請領的皇室土地）西山靜宜園，爲天主教教中青年，辦國學專修班，以輔仁社稱之。1918 年停辦。其時陳垣即爲輔仁社教師。美國本篤會聖文森會院確定來華後，購得濤貝勒府爲辦校地點，因英斂之爲提倡天主教大學重要人物，即預備以英斂之爲校長人選。當時辦大學通常是先設預科，於是在 1925 年，遂在濤貝勒府設此大學預科，同樣以輔仁社稱之。當時稱預備成立的大學爲「北京公教大學」。但英斂之於 1926 年因肝癌去世，由陳垣繼任輔仁社社長。

〈美國本篤會創設北京公教大學宣言〉：

「今本會辦此大學之人，雖皆美產，然其來華本意，絕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屬之品，乃為吸收中國有志愛群之士，本此志願，同功合作。數十年後，不假外力，該會該學，純為中國自主自立之機關，即達其志願矣。」

（二） 大學部開學（1927 年）

1927 年北洋政府核准大學開學，其時僅有文學院中文、歷史、哲學、英文四系。由奧圖爾任校長。

在開學典禮上，教宗駐華代表剛恒毅總主教用希臘箴言、論語、孟子、聖經互相穿插，說明天主教大學求知、求善的本質。他也在那個民族主義高張的時代說了這樣一段話：「我們以基督的情感與基督指示的友誼觀念，使你們能瞭解愛國。我們以真摯、赤誠的心尊重中國人民，不願意有任何傷害中國人民的行動。」在宗教信仰上，「在同學中有不同的信仰，應當互相尊重，互相友愛，這種禮尚往來，是中國傳統的寶貴遺產。但是，對基督的原則不得有所傷害。」這段話是輔仁大學在中國特殊環境中，一開始就奠定的原則。

（三） 輔仁大學改組（1929 年）

1928 年底，來自南方的國民政府統一中國，他們對於輔仁大學的創辦背景不太了解，將之與其反對的帝國主義作了連結，在 1929 年 4 月，即以輔仁只有四系、一院爲由。要將大學降爲學院。爲了因應教育部要求，遂設

立了理工學院、教育學院，同時加強與教育部溝通，終於得到教育部重新發給設立許可。本年度為因應教育部要求，以陳垣擔任校長，奧圖爾改任校務長。

(四) 本篤會財務崩潰

1929年美國發生經濟大恐慌，本篤會支持輔仁大學的財務計劃太大膽、太樂觀，再加上國民政府對輔大的新要求，遂使得本篤會一連串財務槓桿被破壞，產生了巨大的虧損。美國本篤會聖文森會院司泰萊院長是負責財務運作的人，因壓力過大在1930年2月猝逝。

(五) 聖言會接手

教廷為解決此一棘手問題，遂洽詢聖言會接手。聖言會幾經考慮，在1933年正式接手輔仁大學的運作，聖言會在1934年至1935年已有16名神父和修士在大學任職，同時聖言會也開始培育到輔仁大學工作的會士。

初期來華的聖言會士多半來自美國，最早的校務長叫穆爾菲，他在1935年9月猝逝，享年僅40歲，一般相信他去世的原因與學校的龐大財務壓力有關。以後學校在美國芝加哥的募款工作漸上軌道。

一些聖言會初期的重要人物也相繼過世，副校務長李嘉士神父，1934年7月，在北京人的田野調查中，中暑去世。1936年5月，著名的漢學家，創辦華裔學誌的鮑潤生神父，患斑疹傷寒去世。學校董事和語言學教授劉復（中國人劉半農），在1934年在蒙古感染瘧疾去世。1935年聖神會修女也來到北京，負責輔仁女中和大學女生部。

(六) 聖言會接手的理由

王金鏡神父《輔仁英文雜誌》

- ①為求提升中國本地神職人員的能力與文化水準。
- ②協助組成一群開明熱心且有能力的教徒，以領導教友團體如『公教進行會』在中國的活動。
- ③是最直接的，友善的，與非天主教知識分子接觸與增進互相了解的媒介。
- ④因為這是一所宗座（意即屬於教宗）的大學。

(七) 抗戰時期的發展

與北京、清華、燕京相比，輔仁大學規模都不如，但抗戰的發生，提供了輔仁增長的機會，北京、清華在日人控制下都成了偽大學，教授、學生

紛紛離校，一部份到後方，一大部份則進了輔大。1938年學生人數從580人增長為1264人，1939年1585人，1936年9月後，由德國籍的雷冕神父擔任校務長，他德國人的身份，對於維持抗戰時期的輔仁大學有很大幫助。另一方面國民政府（重慶）對輔大也提供了一些秘密的財政支持，是于斌透過教會體系提供了援助。輔大師生也有部份從事秘密的抗日工作。

（八） 中國局勢變化與輔仁被接收

抗戰勝利後，輔仁大學保持了短期的榮景，其抗日的立場，使其在國民政府接收後，未受任何困擾。但國共內戰隨即爆發，北平情勢逐漸不利，學生中也開始出現中共的地下黨及國民黨的學生組織。1949年1月中共軍隊進入北京，中共政府開始陸續干涉輔仁的運作，要求修改課程內容，調整人事，學校氣氛也開始轉變，各種新的師生委員會設立。在沒有辦法維持天主教大學最基本原則的情形下，聖言會決定放棄對輔大的管理權，停止對輔大的資助。1950年10月12日，輔仁大學被中國政府接收。1946年接替雷冕擔任校務長的是美國人芮歌尼神父，他在1951年7月被捕，他被當作美帝的間諜。而校長陳垣則續任校長，1952年，輔仁大學院系調整，大部份系所併入北師大，陳垣續任北師大校長，他從1949年後，即陸續發表了許多反帝的言論，在1948年以後，他逐漸的改變其以往和聖言會合作的態度。

（九） 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的對話—理想與現實的差距

在〈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〉、教宗代表剛恒毅的開學講話、〈美國本篤會創設北京大學宣言〉代表了一種融合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的理想，但現實呢？

在教會方面，來到輔仁的外籍聖言會士，有專業知識，但較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尊重。而且他們是管理階層的管理者，難免會有指揮、控制的態度。

中國的教職員，小部份了解天主教信仰，並能予以尊重，但大部份則不一定認同天主教大學宗旨，甚至抱有一定程度敵意。外國聖言會士語言不通，不一定了解中國籍教職員想法，在抗戰或國民政府時期，中國教職對這些老闆忍氣吞聲，但一旦情勢轉變，他們也就從馴服的羊，變為兇猛的狼，代表人物是陳垣。

對學生來說，他們在大學內實際學到的是兩種東西，一部份從外籍傳教士來，一部份從中國籍教職員來，而他們也較多發現兩方的差異，較少發現兩方的融合。

對中國教職員和學生來說，學校以外環境的變化也牽動著他們的想法，共產主義對一部份師生有吸引力，反對帝國主義也使外籍傳教士成了目標。

當然，在中共建國初期，輔仁再怎麼努力也沒有機會存活，但從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來看，北平輔仁不算成功。從另一面看，我們仍然必須以理解的立場歷史，肯定聖言會士與本篤會士的付出，他們的損失，單從金錢上看，就是一個不可想像的數字。輔仁校友日後的凝聚力，也奠基於這些傳教士的潛移默化。

三、台北輔仁

(一) 在台復校

1. 校友會—

北平輔仁的校友是很有凝聚力的，陸續來台者有數百，其政治立場多半是反共產主義的，其中也有部份已是政府的中高層官員，在 1954~1955 年間，輔仁在台復校，逐漸成為校友們的共識。他們在 1956 年成立校友會，但自己沒有財力或能力辦這天主教大學，於是找上聖言會。1958 年聖言會長舒德來台，表示願意支持輔仁大學在台復校。（舒德曾在中國傳教認識輔仁的重要性。）

2. 于斌—

1901 年生，1936 年被選為南京主教，係第一位中國人首都主教。北平輔仁時期，他曾擔任學校董事，亦曾協助輔仁財務，是中國教會的領袖。他政教關係良好，抗戰時期協助政府做國民外交，政府高層對他讚譽有加。輔仁要在台復校，必須靠于斌的運作。

3. 教廷態度的轉變—

在 1954~1958 年間，教廷已收到很多有關輔仁在台復校的訊息，也做了相關的評估，但設立一所大學是何等龐大工程，台灣的天主教會當時並沒有此種實力，因此教廷暫時按兵不動。1958 年教宗庇護十二世去世，新任宗若望二十三世，改變對台灣態度，將台灣視為「自由中國」，是一個和中國共產黨對抗的自由堡壘，於是積極的促成輔仁大學在台復校。1959 年 11 月 3 日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佈捐款十萬美金拋磚引玉，並任命于斌為輔仁在台復校的校長。

4. 三單位合作模式—

雖然大陸的輔仁是由聖言會主辦，但台北新輔仁代表的是中國天主教學

術，不僅是老輔仁而已。大陸時期耶穌會在上海辦有震旦學院，在天津辦津沽大學，而校長又是中國神職的代表，經過兩年多的磋商，於是形成一種三單位合作辦大學的模式。1961年為使輔大及早開始，於是首先在吉林路籌備處設哲學研究所，同時不斷尋找校地，1963年2月終於買得現在新莊這塊地，10月文、理、法三學院開始在新莊校區開學。三單位在建築上有顏色的差別，彼此有合作，但在財務及人事上是分而治之的。各單位的負責人，有相當高自主的權力。

（二） 核心價值

1. 校歌—

輔仁以友，會友以文，吾校之魂：聖美善真。

三知是求。明德日新；蔚起多士，文質彬彬。

福音勤播，天下歸仁；世進大同，神旨永遵。

祝我輔仁，其壽千春。祝我輔仁，其壽千春。

我們現在的校歌是復校第一任校長于斌在1962年1月20日所寫的詞，可以視為是台北輔仁的理想與核心價值。

第一、二句是北平輔仁的宗旨，代表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融合，也代表台北輔仁與北平輔仁的精神聯繫。第三、四句是台北輔仁的核心，也是我們的校訓，真善美聖，第七、八句中所謂的「三知」指的是三知論，知人、知物、知天。福音勤播之後，就會天下歸仁，基督信仰廣揚後和儒家理想國的境界是一致的，後兩句是對句，世進大同（儒家的理想國）和基督信仰廣傳後的結果也是一樣的。

2. 校訓—

真善美聖

真：學術的共同目標就是追求真理，各學科內容雖有差別，但追求真理之心並無二致，也是所有大學的共通原則。「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，吾人要有崇拜真理的習慣。」

善：指敦品勵行，明明德以止於至善。倫理道德層面，是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建立。

美：存心養性，提高情操。是指人的情感，是為改善人生，充實人生，使人生更優美。

何謂聖，是一種超越境界，指的是人與神的關係，是父子關係，天人合

一關係，是在人間建立天國的關係。

3. 敬天愛人一

「中華文化的最高理想是『敬天愛人』天主教的精華與指歸也是『愛天主在萬有之上而愛人如己』。我是中國人，又是天主教信仰者，所以我人生的最高理想也不外敬愛上主，汎愛眾人。」

這些都是首任校長于斌所言，第二任校長羅光，基本上與于斌意見相通，他們的關係有些像孔子與孟子，在于斌的基礎上，羅光予以發揮，並更進一步在哲學的範圍有所闡發。

(三) 歷任校長

第一任：于斌樞機主教 1961~1978

第二任：羅光總主教 1978~1992 哲學系所

第三任：李震蒙席 1992~1996 哲學系所

第四任：楊敦和教授 1996~2000 法律學系所

第五任：李寧遠教授 2000~2004 食品營養系所

第六任：黎建球教授 2004~2008.1.31 哲學系所

(四) 董事長與教廷監督

台北復校後的首任董事長為田耕莘樞機主教，是聖言會士，中國首位樞機主教，在擔任董事長時，也是台北教區主教。(1961~1967)

田耕莘去世以後，董事會商請蔣夫人宋美齡擔任本校董事長(1967~1990年)，在蔣夫人擔任董事長時，中美堂在1970年完工，是一個「各學院共同聚會的地方」。蔣夫人在1990年請辭，由單國璽主教接任，然後1993~1999年由狄剛總主教擔任董事長，及教廷派遣的監督，在1999年8月再由單國璽樞機主教擔任董事長，而狄剛總主教擔任教廷監督。擔任教廷監督者，是台北教區總主教。總主教更換，則教廷監督亦更換。

(五) 近期大事

1. 三單位整合
2. 醫學院大樓興建
3. 建構輔仁學派

(六) 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（或台灣文化）的對話—理論與現實

在野聲樓一樓大廳牆壁上，寫有輔仁大學的宗旨：

「天主教輔仁大學為追求真善美聖全人教育之師生共同體，致力於中華文化與基督信仰之交融，獻身於學術研究與弘揚真理，以促使社會均衡發展及增進人類福祉。」

由于斌、羅光乃至今天的輔仁學派，都是在這個宗旨的範圍內發展。

理想雖然很好，但現實的狀況呢？

最基本的問題來自於長期「非宗教教育」下培育的高級師資，許多人骨子裏帶有排斥宗教、反對宗教、懷疑宗教、貶低宗教的思維。這種思維隱藏在學術自由的氣氛中，有時甚至形成一種概念，認為宗教不是學術範圍。實際上，神學院不能納入學校的教育系統中，就是此種概念的產物。

另一方面，教會的主事者亦應反省，如果是外國人，真的理解中國文化（或台灣文化）嗎？如果是神職人員，是否有一種高人一等的想法與作法？也必須承認，一些名義上的教友教職員，他的言行，對促進基督信仰，反而是負面的效果。

上述因素影響下，在有限的教育過程中，要期待學生能理解及體會輔仁大學的宗旨，進而認同，發生變化，毋寧是陳義過高的。當然，在有限的教育過程中，師生或多或少亦能感受到輔大的理想，不盡然只是口號。我們不能說自己辦學優秀，但從校友的向心力，可以看到此種潛移默化的效果。

另外的問題是，基督信與傳統中華文化融合的路線，是否需要調整？畢竟在今日的台灣社會，未來可能復校的中國社會，都已有更複雜的文化面貌？

對於一個非基督宗教信徒而言，前述的說法是否令人不舒服？其實這正證明了輔仁大學創校之初，嘗試融合基督信仰與中華文化有其必要性。欲融合即是因有衝突。我們處在一個非基督信徒占大多數的社會中，如何使得輔仁大學能正常發展？

在基督宗教傳入華人地區的歷史中，因為碰到有深厚傳統的中華文化，接觸者大致產生了四種態度：接受、尊重、容忍、排斥。在一個信仰自由的國度中，當然不能強迫，也不可能強迫任何人接受基督宗教。但在一個天主教大學，當然也不希望其教職員學生排斥基督信仰。在一個多元的文化中，我們期望輔大的教職員工生，能接授基督信仰的價值，如果不能，對基督信仰保持尊重的態度，應該是最適當的態度吧。在這個基礎上，

才能有理解與對話。